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六

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 研究论文集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六

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 研究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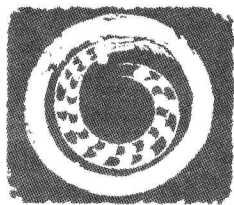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 /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3-033736-8

I. ①早… II. ①北… III. ①夏文化(考古) - 文集②商文化(考古学) - 文集 IV. ①K87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7225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李 茜 / 责任校对: 林青梅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8

字数: 649 000

定价: 1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天有 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长 王天有 王邦维 李伯谦

严文明 宋豫秦 赵化成 赵 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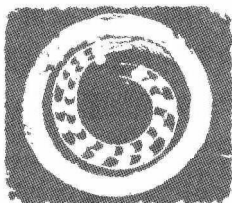
拱玉书 夏正楷 徐天进（常务）

高崇文 郭之虞 程郁缀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No. 26

Collected Studies on the Early-Xia Culture and Proto-Shang Culture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He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Zhengzho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Science Press
Beijing

前言

李伯谦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2008年7月18~20日和2009年7月27~29日,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分别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主办了“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和“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本论文集即是两次会议与会代表提交会议的论文结集。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与会的代表很多,会上且有精彩的发言或新材料的披露,但因未来得及整理成文或其他原因未能全部收入论文集中,是颇为遗憾的。

我们举办这两次研讨会是经过慎重考虑和酝酿的,一来是因为无论是早期夏文化还是先商文化,从它们提出到这时都经过了较长的时间,但一直没有聚到一起交流的机会,我们的目的正是想通过开会提供一个平台,通过交流讨论,以检阅早期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研究的进展和成果,找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不同学术观点的矛盾焦点,进一步明确今后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问题,推进研究的深入。

无论是早期夏文化还是先商文化,都属于原史时期考古研究的问题。欧洲史学家所谓的原史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传统史学上的传说时代,虽然缺乏当时的文字实录,但却有后世史家根据口耳相传史料的追记,其中虽有某些神话色彩甚或荒诞不经之处,但不可否认也包含着史实的素地。因此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虽主要依靠考古学,但也必须要参考有关文献,将两者很好结合起来。当然,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也涉及某些理论问题,正如刘绪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诸如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关系问题、考古学文化的渐变和突变问题、政治事件与考古学文化变迁关系问题、考古学文化演进中的滞后问题等。只有将考古、文献与理论三者密切结合,才有可能取得符合实际的结论。

参加过这两次会议的朋友和看过本论文集的朋友,我想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指引下,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无论是早期夏文化研究还是先商文化研究,都有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就早期夏文化研究而言,在邹衡先生提出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已基本取得共识的基础上,随着有关碳-14测年数据的公布和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新密新砦期遗存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新砦期城址、巩义花地嘴新砦期环壕聚落等的发现,研究者已将其纳入了探讨早期夏文化的视野,从“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期间，我们逐步形成的以王城岗大城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期遗存—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认识，也受到大家的重视和不少同行的认同。尽管目前对何种考古学遗存是早期夏文化还存有歧见，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但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和新砦期遗存作为探讨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和主攻方向，应该说已经是多数关注早期夏文化研究的朋友们的选择了。

就先商文化研究而言，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随着南水北调工程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启动，一大批与先商文化研究有关的遗址相继发现，局面有了新的改观。会上提交的论文和发言表明，随着河北省磁县南城与河南省鹤壁刘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明显特点（以鼎为代表）的先商文化墓地材料的披露，先商文化起源于或部分因素来自岳石文化的观点重又成为热议的焦点；而河北磁县槐树屯遗址的发掘，则不仅填补了下七垣早期先商文化的缺环，而且从传承与发展的角度进一步缩短了其与后岗龙山文化的距离。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虽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将保北型以下岳各庄遗址为代表从下七垣文化中分离出来另外命名为“下岳各庄文化”，并认为其可能是有易氏文化的观点，则得到了更多的响应。下七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划分，随着材料的积累有了进一步的细化，胡保华、王立新的《试论下七垣文化的类型与分期》代表了这方面的新成果；侯卫东提出的在漳河流域下七垣文化可延续至二里头时期，直至洹北商城时期仍可看到某些下七垣文化传统的认识，因有较多材料的支持而受到大家的重视。先商文化研究如同夏文化研究一样，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既取决于新材料的不断增加，也依赖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理论思考的加强。会上，我以《先商文化考古的新征程》为题所作的致辞和段宏振《先商文化考古探索的一些思考》一文可以作为今后开展先商文化具体研究时的参考。

夏文化和先商文化都是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上的重要学术问题，我们希望这两次研讨会，会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解决，增加一些助力。

目 录

前言	李伯谦 (i)
----------	---------

上编 早期夏文化研究

论夏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李先登 (3)
对探讨早期夏文化的几点看法	刘 绪 (7)
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	陈 旭 (16)
嵩山地区夏代早期文化遗址的考察与研究	张松林 (26)
二里头文化聚落动态扫描	许 宏 (31)
二里头文化一期研究初步	常怀颖 (45)
早夏文化的时空变迁	杨树刚 (72)
早夏文化来源研究	吴 倩 (80)
寻找夏都	许顺湛 (96)
夏早期都邑“阳城”与“阳翟”	蔡全法 (104)
登封王城岗城址与禹都阳城	马世之 (113)
早期夏文化与早期夏都探索	张国硕 (120)
郑州大师姑古城与夏之韦国	刘富良 李德方 (128)
郑州大师姑城址学术价值浅识	李 锋 (132)
王湾三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埋葬方式的演进	郜向平 (141)
浅议二里头镶嵌龙形器的面部纹饰复原	王 青 (151)
试论豫南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与周围文化的关系	徐 燕 (160)
鄆县辽瓦店子“夏时期”文化遗存分期初步研究	童 萌 (169)
中国古史传说之洪水说与大禹治水诸史迹的考古学观察	方燕明 (184)
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	王震中 (202)
辨苗二则：物质文化中的故事	程一凡 (209)
豢龙氏、御龙氏考论	郜丽梅 (221)

从考古学材料中“蹲踞式”图像及甲骨文商人高祖“𪚩”字形的内涵——新论

- “夏”字 顾万发 (231)
- 史前时期晋南和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宋建忠 (237)
- “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常怀颖 (250)

下编 先商文化研究

- 先商文化考古的新征程——在“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 李伯谦 (259)
- 先商文化考古学探索的一些思考 段宏振 (262)
- 太行山东麓北部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述论 徐海峰 (272)
- 再论下岳各庄文化 张渭莲 (283)
- 论先商文化补要类型 王 迅 (291)
- 试论下七垣文化的类型与分期 胡保华 王立新 (296)
- 试论漳洹流域下七垣文化的年代和性质 侯卫东 (323)
- 河南辉县琉璃阁第一灰坑检视 李维明 (337)
- 孙村遗址的先商文化遗存 张国硕 刘丁辉 (347)
- 河北磁县南城遗址浅析 石 磊 王会民 梁 亮 (357)
- 河北磁县几处先商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探索 乔登云 (377)
- 对夏商分界的一点看法 谢 肃 (389)
- 试论黄河前套地区含陶铃、陶靴形器诸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归属——兼论带铃铜器
与靴形铜器的文化渊源 王 俊 宋建忠 (399)
- 关于中国早期石磬的几个问题 郭 明 (411)
- 首届“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赵新平 徐海峰 常怀颖 (432)

上编 早期夏文化研究

论夏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李先登

(中国国家博物馆)

夏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正式进入文明时期。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指的是夏王朝时期夏人（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此首先需要申明的是，我认为夏王朝的建立应从大禹开始，夏王朝是大禹及其子启共同建立的。大禹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帝舜）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即大禹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治平了洪水，使人民安居，生产恢复，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继续向前发展。二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高瞻远瞩，果断地决定并实施“禹传启，家天下”，改变各族大联盟领袖的选举禅让制为父传子世袭制，使王权最终形成，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即大禹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转变的关键时刻，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但实际上，“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①。城址的始建年代为王城岗2期，其碳-14测定年代ZK581为距今4000年±65年（约前2050年）以及距今3885年±80年（约前1935年）^②。安金槐先生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诸如《史记·夏本纪》：“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裴骃集解引汉代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并结合王城岗遗址东面的东周、汉代阳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提出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之所在^③。这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实际的，是可信的。2002年至2005年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的发现，其面积达30万平方米以上，建于王城岗新2期（原来的王城岗2期和3期），其碳-14测定年代为，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七）》，《考古》1980年第4期。

③ 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2期。

上限：前2100~前2050年，或前2110~前2045年。下限：前2070~前2030年，或前2100~前2020年。其中值为前2055年^①。进一步证实王城岗遗址就是“禹都阳城”之所在。

上述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发掘，结合近年新密新砦城址的发掘^②以及巩义花地咀遗址的发掘^③等，有力地说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类型（或称为王湾三期文化）（包括新砦期）是夏文化初期，即早期夏文化，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④。这首先是由于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今河南省西部地区是夏王朝时期夏人的主要居处地。诸如《逸周书·度邑篇》：“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又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其次，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代纪年为前2070年~前1600年^⑤。而上述以登封王城岗城址等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类型的年代恰为夏代初期。再有，不仅在登封王城岗遗址等多处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地层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类型地层之上的地层关系，而且，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煤山类型的文化内涵来看，尤其是陶器类型学研究，说明煤山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二者一脉相承^⑥。这就说明二者是同一族群——夏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而已。这也说明考古学文化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的兴亡并不是同步的。那种认为夏文化仅仅是二里头文化的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实际的。此外，国外有的人反对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古代夏王朝的历史相联系、从而否定夏王朝存在的观点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考古学如果不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服务，那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夏文化（包括初期，即早期夏文化）是青铜时代的文化，是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期的文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是多源一体和统一王朝式，这或可称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中国模式，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对全世界和全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即中国古代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统一的文明，有着先进的核心。尔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统一不断地加强和进入更高的阶段，统一是中国文明的主流。因此，中国古代文明有着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也是五千年来中国古代文明一直向前发展、未曾中断的

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巩义市花地咀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⑤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重要原因之一^①。夏文化（包括初期，即早期夏文化）的特点首先是全国性的王朝都城的出现。登封王城岗“禹都阳城”遗址就是夏文化初期的夏王朝都城，而不是什么地区性的聚落中心。“禹都阳城”是中国历史上正式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建立的第一座王都。王城岗“禹都阳城”城址的出现绝不是颍河上游地区原始社会聚落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夏王朝建立之时，夏王集中全国各族的力量而建成的。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正式进入文明之时，王权政治推动经济文化突飞猛进发展的一种反映。总之，全国性的王朝都城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正式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不是地区性的中心大聚落或城址的出现。并且，我认为登封王城岗城址内出土的玉琮、白陶器等精美重要的文物，可能是夏代九州向中央夏王的贡品。朝贡是统一王权的重要标志，《尚书·禹贡》等古代文献记载的大禹划分九州、制定贡赋制度的记载是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并不是后人的编造。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礼制文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代表的夏文化（包括其初期，即早期夏文化），已是初期的礼制文明，已经开始出现青铜礼器。登封王城岗“禹都阳城”遗址出土的夏文化初期的青铜鬶腹底残片^②以及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的夏文化初期的青铜鬶流口残片^③都是有利的证明。青铜鬶是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青铜礼器，它是用于裸祭祖先神灵的祭器。夏文化初期青铜鬶的发现标志着夏文化已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夏文化是夏代时期各族之中最先进的青铜文化。古代文献记载如《汉书·郊祀志》记载的：“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是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涵的，是不容轻易否定的。

文字的产生是世界各国古代社会正式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中国也是如此。从考古发现来看，夏文化初期已经出现了真正的文字。这就是登封王城岗“禹都阳城”遗址出土的烧制前刻划在黑陶杯残底上的“𠂔”字。此字像两手有所执持，乃会意字，即“共”字。出土于王城岗遗址 H473 之中。H473 属于王城岗 3 期，是王城岗城址的繁荣使用期，属于夏文化初期，即早期夏文化时期^④。夏代的文字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也有发现，例如“𠂔”字^⑤，应即“鄆”（郭）字，象城郭之形。以上二例都已是真正的文字，与此前的刻划符号有着本质的不同。或认为只有在夏文化中发现了象商代甲骨文那么丰富的文字资料，才能承认夏代已有文字。我认为夏文化考古工作从 1959 年徐旭

① 李先登：《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

② 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 年第 11 期。

③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 2000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 年第 3 期。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生先生豫西考古调查开始，迄今已有 50 年了。50 年来夏文化的考古工作，尤其是都城考古工作已作了很多，象商代甲骨文那样众多的夏代的甲骨文字迄今未有发现。这只能说明夏人与商人的习俗是不同的，夏人并不在占卜之后刻写甲骨文。因此，不能用商人的标准来要求夏人。而夏文化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陶文就是夏代的文字。文字的出现是夏文化（包括初期，即早期夏文化）的本质特点之一，是夏文化已正式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探讨早期夏文化的几点看法

刘 绪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考古界主动探讨夏文化若从 1959 年算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五十年来，经过大家努力，目前已取得相当大的共识，即绝大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尚存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夏代夏文化上下限的具体确定，也就是夏代夏文化分别开始和结束于何时。关于他的下限，除个别学者坚持 20 世纪 60 年代就提出的二里头文化二期（当时称中期）之末外，其他学者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夏代夏文化结束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末，或第四期早段之末；另一种认为结束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实际上，这两种认识的分歧并不太大，也就一期或半期之差。考古学文化性质的区分能达到如此接近的程度，基本可以认为是大体一致了。关于夏文化的上限，也就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大家根据现有的资料发表了很多有益的看法。虽未达成较一致的共识，但将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开展。

结合本次会议讨论，我想就以下若干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请批评^①。

一、年代问题的另类推测

年代是任何考古学文化都必须明确的问题。要确定早期夏文化，则首先要明确夏代开始于何时。对此，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前 21 世纪。这一结论的得出，无论是传统的研究，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都是从周代开始，由晚及早进行推算的。即由东周始年依次叠加西周积年、商代积年和夏代积年而得出。由于文献记载的各代积年说法不一，研究者尽管或多或少地参考其他方面的论证以决定取舍，但结论仍然互有区别，其中前 21 世纪说占有主导地位。

以往各家取舍三代各自积年时，较普遍地忽视了由各代世数推算其积年的探讨^②。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需要予以重视，在确定三代各自积年时不能不予以考虑。

三代世系在《史记》等文献中有明确记载，除夏世系外，商、周二代的世系还得

① 本文据“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② 日本学者有所关注，见饭岛武次：《夏殷文化の考古学研究》，山川出版社，1985 年。

到了当时文字材料的证实，如殷墟甲骨文之于商世系，逯盘之于周世系等。因此学界都承认其可靠性。至于夏世系的可靠程度，由于甲骨文对《史记》等文献所记部分商先公世系的确认，作为与之同时的夏世系，大家也认为是可信的。所以，在推断夏商周三代各自积年时，各代世系便成为基础，各代世数或王数便与之密切相关，甚至还涉及王年。

要据世数或王数推算各代积年，首先要明确各代世数与王数。依《史记》记载，三代世数与王数如下。

西周世数与王数：11 世 12 王（武王至幽王）。

商代世数与王数：17 世 29 王（汤至纣）。

夏代世数与王数：14 世 17 王（禹至桀）。

三代每世平均多少年，不得而知。但按常理并参考周代男子成年（成丁、加冠或成婚之年）标准估计，每世约 20 年，最多不过 30 年（壮年、而立之年）。若按每世平均 20 年计算，则三代各自积年约为：

西周积年约：220 年。

商代积年约：340 年。

夏代积年约：280 年。

若把兄终弟及每世之数可能较父死子及每世之数稍长的因素计算在内，每弟及一世再加 10 年，如此，三代积年分别是：

西周弟及一世，加 10 年，西周积年约为： $220 + 10 = 230$ 年。

商代凡 8 世为兄终弟及，共加 80 年，则商代积年约为： $340 + 80 = 420$ 年。

夏代也有兄终弟及，凡 3 世，再加 30 年，则夏代积年约为： $280 + 30 = 310$ 年。

如此，我们从东周始年前推，三代始年分别约为：

西周始年：约前 $770 + 230 = 1000$ 年。

商代始年：约前 $1000 + 420 = 1420$ 年。

夏代始年：约前 $1420 + 310 = 1730$ 年。

考虑到 20 岁成婚未必当年得子，若以成婚后平均三年内可得长子，即按每世平均 23 年计算，则三代各自积年约为：

西周积年约： $253 + 10$ （弟及部分） $= 263$ 年。

商代积年约： $391 + 80$ （弟及部分） $= 471$ 年。

夏代积年约： $322 + 30$ （弟及部分） $= 352$ 年。

如此，三代始年分别约为：

西周始年：约前 $770 + 263 = 1033$ 年。

商代始年：约前 $1033 + 471 = 1504$ 年。

夏代始年：约前 $1504 + 352 = 1856$ 年。

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对每世约有多少年的估算上，虽没有采用文献所见任何有